

意识形态话语权视域下苏联解体的动因及启示

张传泉, 唐靖文, 邓伊婕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 苏联解体是历史合力的必然结果, 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与新思维”, 主动放弃意识形态话语权, 影响尤为直接。脱离实际的民主化、毫无原则的公开性、放任自流的多元化、拥抱西方的国际化, 成为苏联意识形态变异的温床。背离马克思主义, 话语内核失重; 苏共执政地位边缘化, 话语主体失位; 新闻舆论自由化, 话语内容失控; 西方“和平演变”大行其道, 国际话语失衡。苏联解体是前车之鉴, 倘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放松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放任新闻舆论, 放纵西方“和平演变”, 就会亡党亡国。中国要吸取苏联教训,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 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并重, 坚持扩大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意识形态话语权; 苏联共产党; 苏联解体;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6-0027-07

收稿日期: 2024-09-28

基金项目: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1LLMLB104):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作者简介: 张传泉(1987-), 男, 山东泰安人,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唐靖文(2000-), 女, 湖北枣阳人,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邓伊婕(1997-), 女, 陕西安康人,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6.009

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会凭空出现, 苏联解体是历史合力的必然结果。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 以及西方长期的“和平演变”等诸多因素固然不容忽视, 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与新思维”, 主动放弃意识形态话语权, 影响尤为直接。意识形态危机与苏联解体的研究由来已久, 主要体现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历史虚无主义泛滥, 全盘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苏共历史, 错误言论误导了民众。^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矫枉过正, 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就存在内在的顽疾, 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十分脆弱, 意识形态在受众广度和深度上受阻。^③ 上述观点基于不同的视角, 见仁见智, 说明了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动因, 但尚未深入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维度。本文通过剖析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基本内涵, 试图从意识形态话语权视域下探究苏联解体的历史动因, 凸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现实向度。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基本内涵

苏联后期发展缓慢, 社会矛盾突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 并未意识到苏联模式的症结所在, 仍用传统行政命令的方式, 推行计划经济“加速战略”。当“加速”受阻后, 戈尔巴乔夫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出版《改革与新思维》, 以此指导苏联国内改革和对外关系, 着力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脱离实际的民主化、

① 胡中月:《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第69-74页。

② 伍志燕:《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及历史教训》,《湖湘论坛》2019年第2期,第102-104页。

③ 吴玉军、刘娟娟:《国家认同视域下的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及启示》,《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0-56页。

毫无原则的公开性、放任自流的多元化、拥抱西方的国际化，成为苏联意识形态变异的温床。

（一）脱离实际的民主化

“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首要观点，是“改革与新思维”的灵魂。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①“人的因素，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我们的主要潜力，而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的途径则是民主化。”^②他所强调的“民主化”是扩大人民自治，发展直接民主，让劳动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民主化”不仅作为思想原则和政治方针，还是撬动改革的有利武器。一方面，在政治上，以差额选举、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实现“民主化”落地，保证法令和纪律的严格施行。另一方面，在经济上，“选举经济领导人是生产部门的直接民主”^③，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和潜力，提高劳动集体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保证生产力的全面提高。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直言：“只有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才能杜绝根深蒂固的漠不关心态度，使劳动者的社会政治积极性有极大的动力。只有通过他们本身有利害关系地和有意识地参加所有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目的。”^④他主张给予人民足够的权力，只有通过民主、依靠民主，才能推动改革的进程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然而，由于当时的苏联民众政治参与素养未能达到直接民主的门槛，“民主化”及其相关政策实际上无法实施，这样的设想脱离了客观实际，无疑充满着理想化的意味。

（二）毫无原则的公开性

“公开性”一词在列宁时期便开始使用，强调对党内事务“有条件有原则地公开”，其初衷是为了拓宽党同人民的联系渠道，更广泛地了解社会舆论和人民意愿。戈尔巴乔夫主张“最大限度的开放性”，全面揭露并及时公开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阴暗角落”、“消极现象”，以便让人民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戈尔巴乔夫多次谈到：“公开性是全民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⑤“公开性”是作为改革的助推器、实现“民主化”的有效工具存在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现代社会主义。”^⑥在戈尔巴乔夫的预想中，人民借助“公开性”，可以了解政策方针的内容和实施进程，能够更充分地参与民主决策。通过解除对于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人民可以获得表达意志、反映意见和情绪的渠道，能够毫无顾忌地说出想法。戈尔巴乔夫说：“扩大公开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不是玩弄民主的把戏，而是党的原则立场。”^⑦这种假借党的原则立场来扩大的“公开性”，实则是毫无原则的“公开性”，严重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在现实中，由于未对消极社会信息和反动舆论内容进行合理的监督和约束，承载着美好愿景的“公开性”，在实践中变成了“刨祖坟”。它终究不是推动苏联改革的灵丹，反而成为促使苏联解体的毒药。

（三）放任自流的多元化

“多元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意在破除“精神垄断”。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结构、经济成分、利益关系都具有多元性，意识形态要与之相适应。他主张破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倡导多元的思想自由传播、优胜劣汰。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苏联改革最初是舆论“多元化”、意见“多元化”，逐步走向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经济领域深受“多元化”的影响，多种利益诉求暗流涌动。戈尔巴乔夫提出“非国有化”、“私有化”的方针，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打破了高度集中的国有制“垄断性”局面。“多元化”的实践结果是自毁长城，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动摇了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思想和舆论导向有误，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各种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恣意生长，各种谩骂、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成灾。许多报刊打着“多元化”的旗号，热衷于吹嘘宣传西方制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调转枪头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暴露和夸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没有站稳政治立场，

^{①②③⑤⑥⑦}[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1页，第125页，第126页，第89页，第95页，第92页。

^④黄宏、纪玉祥：《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反而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讲政治原则，在错误的思想舆论裹挟中人云亦云。理想信念不牢，地动山摇，苏联社会主义堡垒从内部遭到破坏。

（四）拥抱西方的国际化

国际化集中体现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具体来说，它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关于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主张停止冷战、停止军备竞赛，为国内经济、政治领域的改革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他提出以“普遍安全”替代“单方面安全”，核战争没有真正的赢家。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他提出遵循和平共处的政治方针，让和平共处成为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第三，关于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随着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附的整体性趋势向前发展，世界经济正日益国际化。他提出打破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束缚，加强苏联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第四，关于价值观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和阶级价值，“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①他提出坚持以平等的原则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务，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客观上对世界秩序变革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抱有过分的幻想，他关于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消除国际意识形态对立等诸如此类的言论不过是镜花水月。

二、意识形态话语权视域下苏联解体的深刻动因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矫枉过正，意识形态体制由僵化、泛化转向淡化，各种诉求竞相发声。他在错误的轨道上推行苏联改革，妄想从教条主义一步跨越到“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国际化，导致背离马克思主义、苏共执政地位边缘化、新闻舆论自由化、西方“和平演变”大行其道，最终丧失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加速了苏联解体。

（一）背离马克思主义，话语内核失重

在苏联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把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局限性甚至已经过时，将其视为传统意识形态束缚，以意识形态“公开性”、“多元化”为托辞，在党内外实行各种意识形态一律平等、自由竞争。苏共党纲、党章中不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表明苏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把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相让。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和团体，可以随意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国内外敌对势力极力进行思想渗透，意识形态舆论场泛滥成灾。

戈尔巴乔夫打着发展社会主义的旗号，把矛头对准“暴力的专制社会主义”。他鼓吹超阶级、超国家的全人类利益，淡化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等错误论断，这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一大批历史虚无主义者趁虚而入，趁机发难，强调十月革命的偶然性，甚至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总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修正主义，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截然对立。从科学社会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背叛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复辟资本主义。“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麻痹性，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道而驰，削弱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其造成的危害是滴水石穿、愈演愈烈。当资产阶级思想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会葬送。

（二）苏共执政地位边缘化，话语主体失位

^①[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理应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但由于苏联宪法改革，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被削弱。戈尔巴乔夫首先提出恢复“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维埃代替苏联共产党行使权力。随后，戈尔巴乔夫强调各级苏维埃主席和党委书记应由一人兼任，他同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由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索布恰克组成的“跨地区议员团”带头取缔了宪法第六条——“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核心”，他们主张将所有联盟成员国变成联盟主体，各联盟主体自行成立人民代表大会。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以总统制限制苏维埃权力的法律，这意味着苏共总书记的职位彻底成为了空洞的头衔。

苏联开启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允许多个政党共同管理国家事务。“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出现了约 20 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竟多达 500 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① 尽管形形色色的政党各自理念不同，但对苏联共产党采取围猎之势，肆意攻击苏共领导地位，步步蚕食苏共领导权。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苏共二十八大正式通过决议，苏联共产党不再是法定的执政党，而只是参与执政的议会党。苏联共产党从法理上被边缘化，丧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绝对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权随之旁落。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等于否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政权随之变色、变质、变味。苏共党员的信心遭到沉重打击，新增党员数量急速下降，退党现象屡见不鲜。

（三）新闻舆论自由化，话语内容失控

新闻舆论虽然唤醒了民众的政治意识，但滑向了自由化的深渊。戈尔巴乔夫要求公开党和政府的全部工作，党政干部广泛听取民众意见。“民主化”、“公开性”得到了重视，但实施的领域和程度成为了盲点。戈尔巴乔夫过分强调新闻舆论作为监督者和批评者的地位，禁止苏共中央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他猛烈批评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要求修订历史教科书，从重评历史入手推动“公开性”的实行。“但在苏共长期掩盖历史、粉饰现实的背景下，一步到位地过渡到没有限制的公开性是矫枉过正。”^② 敌对势力迎合人们猎奇心理，兜售反苏联、反苏共的错误言论。新闻媒体不再是苏共的“耳目喉舌”，而是自说自话，任意报道，甚至虚假炒作，丧失了维护统治、宣传正道、启迪人心的社会功能。

文化宣传部门虽为苏共党委附属，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放任自流。作为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雅科夫列夫极力推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任用了一大批深受西方影响、主张西化的编辑，导致苏共报刊阵地失守。面对来势汹汹的错误言论，戈尔巴乔夫选择了逃避，非但没有纠错，反而在新闻事业上“放手”，无原则的后退给了敌对势力高谈阔论的机会。敌对势力在“公开性”的保护下，恣意宣传自己的观点，肆无忌惮散布谣言，制造和传播苏共黑色政治笑话，在社会上渲染对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受此误导，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讨论的话题没有边界。言论的自由得到保障，言论的正确与否却遭到忽略，丑化苏共形象、调侃苏共领导人成了一种“时尚”。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威信遭到冲击，但因为丧失了舆论控制权，无法有效地自我辩白，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醍醐灌顶”变成了“火上浇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种种矛盾被成倍地暴露出来，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无法化解，最终演变成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动摇。

（四）西方“和平演变”大行其道，国际话语失衡

在美苏争霸、两大阵营对抗的态势下，以杜勒斯为代表的西方人士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宣传西方价值观念，企图从思想上瓦解苏联共产党战斗堡垒，动摇苏联军心民心。西方国家首先宣传“自由”、“民主”、“人权”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继而掌握何为“自由”、“民主”、“人权”的话语权，“‘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甚至用 40 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③，为西方“和平演变”开道，力求用西方模式替换苏联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被西方理论所迷惑，落

①③李慎明：《苏联亡党亡国 20 周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9 页，第 71 页。

②左凤荣：《苏联史：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69 页。

入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陷阱。他所谓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实质就是承认西方“普世价值”，投入西方怀抱。当苏联陷入困境之时，西方趁机抛出“橄榄枝”，戈尔巴乔夫采取“开放宽容”的姿态，主动放弃对外舆论斗争，宣布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引入数十种西方国家的报刊。西方学界利用新闻媒体，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评头论足，贬低共产党执政能力，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加深了苏联意识形态危机。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人士，极力对抗马克思主义，鼓吹共产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不同群体中广泛渗透，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管不完全符合事实，但还是逐渐蔓延开来并成为了主流舆论。历史表明，戈尔巴乔夫照搬西方模式无异于饮鸩止渴，他对西方社会的拥抱不过是单相思，纵容西方“和平演变”反受其害。西方国家打着“族际关系民主化”的旗号，挑唆苏联各民族的矛盾，破坏苏联国家稳定，煽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独立。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视域下苏联解体的当代启示

苏联解体是前车之鉴，倘若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放松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放任新闻舆论，放纵西方“和平演变”，就会亡党亡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要吸取苏联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并重，坚持扩大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都是一元主导，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占据统治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①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马克思主义思想防线被攻破，政党政权土崩瓦解。当今社会充斥着数量庞大、真假难辨的信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此起彼伏，民众极易受到误导。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不二选择，又是化解意识形态危机、打赢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把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共产党人的必修课。首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构建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信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用一元统摄多样。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占领理论制高点，登高而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补足理想信念之“钙”，使意识形态工作落地生根。最后，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被大众接受的程度，必须为民代言，反映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增强生活场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感染力和说服力。

（二）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决不允许党员干部信口开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乱。”^① 有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干部“吃饭砸锅”，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喇叭，成了苏联、苏共的掘墓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把报纸、刊物、电视、电台、通讯社等宣传工具完全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引领思想舆论潮流。改革开放后，有别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因此，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这既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又是社会稳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新时代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更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②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举旗定向、人心向背，党的领导是“定盘星”和“指南针”。首先，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都要坚定政治立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捍卫“两个确立”，在党言党，知党信党。其次，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种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田”，坚决维护党的声誉，积极传播党的声音。最后，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考核机制，及时排查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隐患，准确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形成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尽责的工作局面，构筑意识形态坚强堡垒。

（三）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并重

语言的背后是思想，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意“晴雨表”、社会“黏合剂”、发展“推进器”，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迷魂汤”、社会“分离器”、动乱“催化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③ 苏联共产党蜕变成乌合之众，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生事。当今中国的舆论环境、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但仍有历史虚无主义者等敌对分子改头换面，借助网络兴风作浪。因此，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并重，这既是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举措，又是切实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的基本方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一方面，树立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维护党报党刊的权威性，用事实说话，在意识形态阵地掌握主动权、增强说服力。另一方面，增强洞察力和敏锐性，对历史虚无主义保持高度警觉、自然免疫，对错误言论敢于“亮剑”，坚决反对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的言论。习近平总书记批评：“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④ 高校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宣扬谬论误导青年的特殊场所，是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前沿阵地。必须加强党委领导，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机制，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四）坚持扩大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

国际舆论场是客观存在的空间，话语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方式。国际话语权总体上呈现为“西强我弱”，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操纵国际舆论，误导视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⑤ 苏东剧变后，西方政界鼓吹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崩溃了，宣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千方百计地引诱中国发生苏联那样的演变。时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

^{①③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33-134 页，第 113 页，第 109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27 页。

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以新的方式和手段渗透西方意识形态，实施“棱镜”等网络监控。因此，坚持扩大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这既是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又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际形象的必然逻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愈加凸显。一方面，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抵制西方“普世价值”，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话语霸权中打入离心化的楔子。另一方面，我们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推动内宣外宣联动发展，展现东方大国、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把握好中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说服力。”^① 具体而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创新传播方式和搭建传播平台，建构以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为核心、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对外话语体系。扩大官方渠道，引导民间渠道，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利用“一带一路”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打响“中国招牌”。建设好全球孔子学院，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生特殊群体，培养造就新时代“斯诺”，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The Moti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ZHANG Chuan-quan; TANG Jing-wen; DENG Yi-jie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forces of history. Gorbachev's call for "reform and new thinking" and his abandonment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had a direct impact on it. Unrealistic democratization, unprincipled openness unfettered pl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embracing the West became the catalyst of Soviet ideological mutation. Departure from Marxism has led to a deviation at the core of discours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ruling position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has dislocated the main body of the discourse;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has led to the loss of control over the content of the discourse; and the prevalence of "peaceful evolution" in the West has led to an imbal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erves as a crucial historical lesson. If we were to abandon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Marxism, loosen th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of ideological work, allow unrestricted freedom to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and indulge in the "peaceful evolution" of the West, we would lose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China must draw the lesso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ensure that Marxism guides all our ideological work, uphol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leadership over public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media, give equal weight to positive communication and the battle for public opinion, and expand socialist discourse pow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Key words: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Marxism

[责任编辑 常伟]

①张传泉：《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基础、光辉历程及宝贵经验》，《理论学刊》2023年第6期，第61页。